

# 一个山区村落走向终结的思考

高燕,郑丽香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的山区村落由于村民的逐渐离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闽北山区的官洋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不断离开村庄,对村落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该村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的边界在逐渐解体,走向所谓的村落的终结。与官洋村类似的山区村落全国有很多,逐渐衰弱乃至走向终结将成为它们的必然趋势,此类村落的终结与大城市郊区城中村的终结不同,值得引起重视。

**关键词** 山区村落;变化;终结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0)04-0026-04

中国传统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稳定、有一套自身运行机制的共同体。在外界的力量尚未影响之时,村民的生活是安逸的、朴实的,给人以安全、稳定之感。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平衡,撼动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命运。一直以来,关注、研究村落的生存、转型、变迁及其前景是社会学家的使命。近年来,我国的村落正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从1985~2005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村落数量在锐减,自然村1985年约有365万个,到了2005年只剩下300万个左右,即平均每天减少约89个村落<sup>[1]</sup>。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传统村落变迁的研究逐年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李培林及其博士生蓝宇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做的关于村落终结的研究,代表作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和《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证研究》;“城中村”、“终结”等词成了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周围村落变化的核心词。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临近大城市的村落,经济较为发达,这些村落凭借与城市的紧密联系,快速实现了向城市社区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关注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农民外出以后对村落的影响,是否一些村落也在走向终结?它们与城中村中的终结相比有何特点?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选

取了闽北的一个山区村落官洋村<sup>①</sup>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无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并通过该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离开村庄的现象看到了村落走向终结的趋向,通过对该村走向的探讨思考村落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问题。

## 一、官洋村90年代以来的变化及走势

官洋村位于福安市东部,为福建省福安市城阳乡第一大行政村,距市区20 km。村中只有一条70年代由村民自费修筑的城河公路与外界相通,并与邻村连接起来。官洋村始祖宋朝时从福州长乐迁居至此已有700多年。改革开放后,全村人口2226人,承包地173.3 hm<sup>2</sup>,山地和林地大约有2000 hm<sup>2</sup>,辖4个自然村(官洋上村、官洋下村、郑洋村和雷柏洋村),12个村民小组。村民以郑姓为主,超过总人口的75%,其余为孙姓。其中官洋上村和官洋下村两个村规模最大,占官洋村总人口90%以上。官洋村地形相对比较闭塞,四面环山,像个盆地。村民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为水稻和蔬菜,还有部分茶叶和太子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90年代中后期,该地区才开始真正受到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影响。村中人口开始大量外流,至今该村只剩约400多人,不到原人口的20%,而且多为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这对村落社会结构造成很大冲击,也引起村落其他方面的变化。

收稿日期:2010-09-02

作者简介:高燕(1969—),女,安徽太和人,副教授,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官洋上村和官洋下村,为下文表述方便将直接采用官洋村指代这两个村。

## 1. 村民外出导致村落发生变化

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外界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大,城乡之间的差距致使大部分村民都产生了外迁动机。官洋村在近20年的时间里,外出村民超过了3/4,只留下一些离开村庄就无法生存的中老年人。村民的离开,对村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村落的物质环境和村民的生产生活,对村落文化也造成了很大冲击,而且离开的村民和留下的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弱化,这一切使得原本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开始逐渐解体。

### (1) 村民离开村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村约有1600多村民离开村庄,占村庄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离开村庄的时间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即90年代中后期、2003年前后和2009年前后。在这3个阶段,离开村庄的村民有共性,但每一个阶段离开村庄的人数、离开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差异。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离开村庄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能力较强的中青年,是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其中一些人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基本上都是举家离开的,部分离开村庄的村民一部分到了外省,一部分主要留在了县城福安。留在外省的村民主要是在90年代中后期和2003年前后,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懂得抓住发展机遇,主要从事冶炼、汽配和食品等行业,各方面待遇较好,比那些迁入县城的村民生活水平要高。他们在外大约办有8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以家族形式投资开办的,企业中的部分员工也是官洋村村民,他们大概占到总外出口口的15%左右。这些在外省定居的村民除了与村落中的亲朋好友有一定联系之外,基本上断绝了与村落的联系,搬迁到县城的村民除了一小部分继续从事农业,其余都在县城的工厂里打工,生活水平明显高于村庄里的村民。2003年前进县城的村民基本上都在县城建起了新房(没有房产证),之后进城的村民则租住在县城边缘租金较便宜的地区。这些村民与本村的联系多是在村中村民办红白喜事或清明祭祀时,随着这些村民在县城居住时间的延长和工作时间的束缚,他们与村庄的联系逐渐减弱。

### (2) 村民离开后村落的变化

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那些自认为能力不强,无法在外面生存的人留了下来,当然还有部分留恋农村生活的村民也留下来了。据笔者调查,留下的村民中除了儿童以外年龄都在45岁以上,50岁以上的村民超过95%。他们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务工的子女。

村民离开后,村庄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留下的村民得益于子女外出的收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家庭劳动力的短缺导致村落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而且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村落越来越冷清,留下的村民出于热闹等原因都搬到公路两边,沿公路重新建房或住在已迁出的亲友家。村落呈现出一种“内实外虚”的独特空间结构。同时,人口的持续外迁使得村庄的许多生活服务功能逐渐弱化,留下村民的一些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更不要说日益增加的新需求了。其中,基础教育资源的提供尤其突出,村民子女在村落内无法享受到比较完备的教育资源,比如学生基本上无法使用任何图书资源和体育器材,尤其是学校生源的减少、教师待遇较低等问题影响到了教师资源的提供,甚至无法做到每门课程都有老师讲授。此外,留下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尤其是老人的休闲和小孩的娱乐失去了众多同伴。由于大部分村民都搬迁了,晚饭后左邻右舍或亲戚家串门聊天的景象不再了,而且从前那些大型的娱乐活动也由于村民的流失而逐渐减少,比如从前1个月放映两次电影,现在一两个月才放映一次。

官洋村原本是一个拥有两三千名村民的村落,村民居住在其相对封闭的地域范围内,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生活半径也仅在村落及与之相连接的几个村落之间,村落自身能为村民提供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服务体系,能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村落,村民们通过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接触交流以及各种活动形成对本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人口的不断外迁,村民生产生活的空间不断向外扩展,打破了村落内部的封闭性,降低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自给自足的程度,进而促使村落边界逐渐消失。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所得也成了留守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村落的经济边界发生了改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流失使得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村落事务无法开展,一些行政组织形同虚设,影响了村落的自然边界和行政边界;当村民与外界的联系增多,生活半径的延伸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外界的新鲜事物、不同的思想观念开始动摇村落传统的文化边界,随着村落家族成员的不断外流和祭祀仪式的转移,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不似从前那么亲密,而村民外迁严重影响到村庄一些重大仪式的举行,如结婚、丧葬等仪式中的许多内容被删减了,致使不管是外出的还是留下的村民对本村的归属感不断被分割,对村落的认同感不断弱化。村民职业的转变和生活空间的迁移等,致使村落共同体原有的完整边界开始被动摇<sup>2 B9</sup>。

村民的外流使得村落被一分为二,改变了村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分解了村落的边界。

## 2. 山区村落正在走向终结

面对市场力量、城市化的持续冲击,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村庄可以不变化、不转型,弱小的村落内部力量无法抵抗城市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冲击,简单强化村落共同体的主张和行动在强大的市场力量面前毫无还击之力。但是在面对现代社会这空前复杂的推拉力量时,究竟村落未来将会出现何种变化?是消亡还是新生?村落共同体又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或途径适应这种变化?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村庄的消亡和村庄的现代化(城乡融合)。笔者认为村落共同体的这两种未来趋势与村落自身的地理环境、村落传统以及国家社会的态度等密切相关。对于远离城市、自然资源有限的偏远山区的村落,要么是放任市场力量扫荡村落共同体,满足市场力量对农村劳动力的觊觎,而让乡村社区自生自灭,毫无疑问,在强大的外界力量面前它们只有走向消亡<sup>[3-4]</sup>。它们的消亡是村落在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完全消亡。相比那些临近城市的村庄,虽然也面临着终结的命运,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村落的现代化,既不是消灭村庄,也不是城乡隔离,而是村庄的再造,实现城乡的融合<sup>[5]</sup>。这种融合既有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也有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李培林等所研究的都市村庄(城中村)即是那些被卷入城市化的村落,它们的未来是逐渐被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向城市社区的转变<sup>[2]</sup>。而毛丹认为只有处理好农村与市场、国家、城市的关系后才能顺利实现村落的转型,建立城乡之间的衔接,而这种“依然存在的村庄,主要是为依然存在的农业从业人员提供便利的社区条件,并且向城市中选择乡村生活的返郊、返村的人口开放<sup>[6]</sup>”。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官洋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往外迁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根据学者们对村落共同体的研究以及该村落的现状,笔者认为这个山区村落正走向消亡,即上述第一种意义上的终结,因为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其所必备的因素正在分化,即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的地域、生活方式以及共同意识等。

第一,村民的职业发生转变。传统村落的主人是农民,传统农民的“正业”是务农,但是随着外出人口不断增加,该村村民主要从业已转向非农产业。村落中留下来单纯从事农业耕作的家庭已很少,基本上所有留下来的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即使是那些在县城边缘继续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外出村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他们所从事的农业不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适应。“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仅仅看作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这时候的“农民”成了虚名称,没有了传统农民的意义<sup>[6]175</sup>。可以说,该村即将成为一个“无农的村落”。

第二,土地对村民的价值意义在弱化,重要性在降低。土地是传统村落的重要资源。因为土地,村落才具有明显的边界,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村民的集体认同感。而如今,对该村村民来说,土地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对村民关系的维系力变得十分脆弱。它不是法国乡村社会出现的“相对于机械设备和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来说,土地变成一种不太重要的生产资料”,而是它失去了作为农民生活保障的意义,失去了作为传统村落文化赖以存在的价值。“土地恋”这种情感在该村农民身上在渐渐地消失,这也就使得土地将不再能成为吸引进城农民回乡的因素。

第三,村庄原来相对完善的生活功能逐渐缺失,无法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由于村民的不断外迁,致使村落的生活服务资源、基础教育资源等不断流失,加上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尤其是娱乐方面需求的增加,偏远的山区缺少条件来满足这些需求,因而人们只能到村外去寻找和满足。

第四,村落文化的维系力量在不断弱化。随着人口的外流,土地作为村落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瓦解了,城市文化开始快速进入村民的生活,传统村落文化受到了冲击。随着村民与外界联系的不增多,电视的普及,外出村民带回了城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越来越多的村民趋向于接受城镇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而村落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向城镇生活方式靠拢,村民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作为年青一代外出的村民回乡的这种“文化或文明的‘逆流旅行’”在不断地灌输与村落价值异质的文化,带回新事物和新思想,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sup>[7]</sup>。

第五,村民传统信仰的减弱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变,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最后一道堡垒——社会边界也逐渐淡化。一方面,大部分已买地置房的外迁村民在其新居住地找到了新的归属感,因为其生活环境中的居民多是同背景的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交流接触形成了新的共同意识。而其对村庄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不再熟悉,与原村庄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渐渐弱化。在离开村落之后,其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在城镇,与之联系得多的是同背景、同职业的邻里以及同时搬到县城的亲友老乡,每年只有村中亲友办红白喜事时才回农村,他们原有的亲缘、

地缘关系所发挥作用的地域范围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另一方面,虽然宗族祠堂、祖厅和庙宇等一直以来都是村民共同信仰所寄托之物,但是在该村村民看来,这些东西只需要一些仪式就可其他地方重新建立,就像最早迁到县城的村民,他们可把老家的祖宗牌位请到了城里的新房中进行祭祀,这就使得祭祀活动所发挥的联结亲戚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而对村民来说,象征村落共同信仰的宗族祠堂、庙宇等也有可能像其他村落一样移入新居民点,即使仍留在村落中,也不再具有实质性的象征意义,其拜祭的村民会逐渐减少,最后只是作为一种必须存在而存在。因此,该村就像许多山区村落一样,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等的影响无法实现毛丹等人所希望的“城乡融合”<sup>[6]305</sup>。

## 二、山区村落走向终结的独特性及思考

山区村落的终结不同于“城中村”等其他村落的终结,它拥有与城中村所不同的独特性。同时由于它的独特性使得它无法像城市包围农村或村落兼并那样在某些方面能迅速实现村落的终结,相对来说,它通过人口的阶段性外迁渐渐地、缓慢地走向终结。

首先,远离城镇的该山区村落的村民在无其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手工业的情况下,农业作为传统农民的“正业”再也无法解决村庄日益增长的剩余劳动力,即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满足村民的需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无法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时村落的人口开始向外寻求机会。另外,外出的村民,即使是到最近乡镇打工的村民也无法在打工之余兼顾到农村的土地,而相对于农田的产出,在外打工所得更多,该村村民在离开村庄之前并不会有一些外出农民通常会有顾忌,即“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继续在城市生活,他们将来回到家乡还有土地保障”<sup>[8]</sup>。在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他们也就渐渐忽视了无法移动的土地。而城中村的村民依靠“土地”自然“生长出人民币”的机遇从自给自足的村落小农成为租房谋利的“握手楼主”<sup>[2]26</sup>。村民通过“造房运动”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加上土地征用的补偿,让城中村的村民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仍能维持生活甚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需要外出以寻找其他生活方式。因此,导致该山区村落最终走向终结与城中村所演绎的终结过程不同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此。

其次,该山区村落原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社区,人们对外界新事物的了解都比较晚,受外界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也较迟。在随着城市文化的逐渐注入,村落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是这种转

变的过程受到村庄与外界接触频繁程度的影响,它不可能像“城中村”那样被城市包围后在生产 and 生活方式上迅速转换,转眼间变成富有工商谋略的“个体企业家”。也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城中村的终结过程是比较快的。但随着该山区村落人口的大量外流,在迁入地重新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村民的村落归属感、认同感渐渐弱化。而城中村的村民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对他们来说,“村籍”、“村集体”仍具有很强的存在意识,致使城中村的终结相对来说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久、过程更复杂。

## 参考文献:

- [1] 胡必亮. 将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紧密结合起来 [EB/OL]. (2007-04-26 [2010-05-21]). <http://www.chinado.cn/ReadNews.asp?NewsID=960>.
- [2] 李培林. 村落的终结: 羊城村的故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6-42.
- [3] 李君甫. 走向终结的村落: 山区人口流失、社会衰微与扶贫政策思考 [J]. 理论导刊, 2006, 41(5): 41-43.
- [4] 江涛.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 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1): 23-27.
- [5] 毛丹. 浙江村庄的转型与前景: 三个关系维度 [EB/OL]. (2008-11-29 [2010-6-28]). [http://www.gmw.cn/content/2008-11/29/content\\_859043.htm](http://www.gmw.cn/content/2008-11/29/content_859043.htm).
- [6] 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7] 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 [C]// 李培林.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60.
- [8] 郭欣欣, 王锐铭. 中国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 [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8, 25(4): 10-13.

## · 简讯 ·

### 江苏省社会学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 2010 学术年会在河海大学召开

11月20日,江苏省社会学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2010学术年会在河海大学举行。大会由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和河海大学联合主办。河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济干出席大会并致欢迎辞。大会审议了第五届社会学学会会长宋林飞教授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第六届江苏省社会学学会理事会,宋林飞教授连任江苏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我校王济干教授、施国庆教授当选副会长。学术报告环节中,部分与会专家围绕“社会学与社会建设”作了大会主题报告。

(本刊编辑部供稿)